

X U E Y U A N Y I N G H U A

朗润
琐言

LANGRUN SUOYAN

学苑英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

季羨林

朗润
琐言

季羨林

蒋忠新 王邦维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国平

封面设计：袁银昌

学苑英华

朗润琐言

季羨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6 字数 254,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500册

ISBN 7-5321-1531-3/1·1217 定价：20.00元



作者 1995 年摄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序

承元化先生垂青，让我在“学苑英华”丛书中滥竽充数。逖听之下，既感且愧。感从何来？其理自明，用不着再说。愧又从何来呢？盖我颇有点自知之明。在义理、辞章、考据三门学问中，我最怕前者，独爱后者。义理这东西，由于天赋所限，我总觉得恍兮惚兮，过于圆融无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又有理。我脑筋板滞，实在有点跟不上。我喜欢考据这种似乎能抓得住看得见的东西。写起来放心，谈起来也放心。偏偏又窃以为元化先生让我做的事，属于前者。即使是选过去写过的文章，不用新写，我仍然选不出。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婉言谢绝。

然而上海文艺出版社穷追不舍。倘不如愿，决不善罢甘休。因此，我思之再三，还是答应了下来。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认为，这样的结果最好。虽然我心里仍然是惴惴不安也顾不得那样多了。

虽然答应了下来，事情自己却又做不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确实太忙。我自己也说不出，我今年交的是什么运。我想，

连最能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的算命先生碰到了今年的我，也会没了辙。一方面是大喜之年。屈指一算，我今年出书能远远超出过去的纪录。24卷的“文集”能出20卷，剩下的4卷，年底可以全部交稿。“续编”的前两卷，材料已经完全具备。另外还能出版各种各样的书七八种。一介书生，升官无用，发财不想，能出上一本书，就宛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了，何况竟能出这样多。我是什么心情，读者一想就能明白了。连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都由于编成了一部新诗集而狂喜赋诗赠给他的朋友元稹：“莫怪气粗言语重，新编一十卷诗成。”何况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呢？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仿佛交了华盖运。如果说我这后半生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不肯浪费半寸光阴，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近两三年以来，我拚命苦干；但是，工作怎样也做不完，文债怎样也还不完，身心交瘁，日夜难安。外面来的书报信件，盈几盈案，我却无法一一过目。好多应该答复的信，都没有答复。有人怀疑我傲慢不恭。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几乎每天都是宾客盈门，有“速”者，也有不速之客。还要充当采访的对象，拍照的道具。拍照者高声大叫：“笑一笑！”我怎样能笑得出来呢？结果当然会像电影《瞧这一家子》中的一个镜头那样，陈强同志做出怪模样来“笑一笑”。但是，那是喜剧片，专门逗人乐子的。我却是处在现实生活中。我演的不是喜剧，而几乎是悲剧了。

更让我焦心的还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交稿的任务。我一时掉以轻心，答应了德法两国的两位著名的吐火罗文学者的建议，同一家德国出版者签定了一份合同，用英文译释我已搞过

多年的在中国新疆出土的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交稿日期原定去年，后改为今年 2 月，又改为今年 6 月。我原以为我已搞过多年，虽然并未全力以赴，然而还自认是有基础的，经过一年多的整理翻译，今年 6 月交稿，决无问题。然而，一接触实际才发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基础。稍一细究，便到处发现拦路虎。我去年拚搏了一整年，今年又将近过去了一半；可我仍处在拚搏中，彻底定稿的日期，仍尚无法确定。

然而，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话现在正应在我身上。德国之稿未交，出版我的“文集”的江西教育出版社，又发来了十万火急的电讯：“文集”本定在八五规划期间完成，而今九五规划已经开始了将近半年。我的书稿还没有全部完成。这正又应了两句俗话：“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我现在真是中西交迫，内外夹攻，简直没有喘息的余地。静夜自思，无端怜悯起自己来。自己已年届耄耋，正向着鲁迅所说的那一个开着野百合花的地方走去。偏偏道路极不平坦，有如在风光旖旎的燕园中，今天这里挖一条沟，明天那里凿一个洞，让我这个在这里住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北大，有时候竟也摸不着头脑。未知何日天下道路都变得平坦起来，让我这个已毫无所图又毫无所求的老人能够安然坦然地走到那一个非去不行的地方。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接受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建议，出这样一本书。根据我对义理的看法，根据我对这一本书性质的看法，根据我目前忙碌的情况，要我自己来完成，几乎绝对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话既说了出去，就必须兑现，就算我不是“君子”我也是“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眉头不皱，计上心头：求助于别人，最方便最切实

可行的是求助于我的学生，古代称为“弟子”。在我的学生中，同我的研究方向最相近，最能理解我的思路和我的治学方法的莫过于蒋忠新教授和王邦维教授。“有事弟子服其劳”。同他们一商量，果然一口答应，毫无难色，我在大喜之余，只有恭候佳音，等着“有酒食先生饌”了。

了解弟子，莫如自己的老师。我的看法没有错。他们两位经过几度磋商，订下了编写计划，分了工，硬是把我这些长达数百万字的、有时候不能说不枯燥的文章翻检了一遍，一本整整齐齐的稿子便呈现在我眼前。这回是轮到我吃惊了。我那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经他们一整理，居然能整理出一些条理来，看起来颇像那么一回事了。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我现在唯愿我这些不成什么气候的东西能对读者有点用处。不管这用处多么微小，也总算不辜负元化先生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片苦心，不辜负蒋王二位的努力了。如再进一步能冲淡一点我的华盖运，那就更是我求之不得的了。是为序。

季羨林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序	1
一 站在学术新潮流的前面	1
二 陈寅恪的治学方法	4
三 中国的考据学	5
四 德国的考据学	8
五 中国文化的内涵	11
六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	15
七 文化与气节	18
八 爱国主义	20
九 陈寅恪一家三代的爱国主义	22
一〇 为考证辨诬	28
一一 清代考证学之兴起与文字狱无关	30
一二 谈义理	32
一三 说文章	34
一四 论考证	35
一五 勤奋出灵感	39

一六	才、学、识	40
一七	讲道德	43
一八	竭泽而渔的精神	43
一九	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	45
二〇	朱光潜先生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49
二一	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	53
二二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56
二三	歌德看中国文化	62
二四	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	65
二五	综合与分析	67
二六	“天人合一”命题的来源和含义	71
二七	印度的“天人合一”思想	74
二八	张载	75
二九	日本和朝鲜的“天人合一”思想	76
三〇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80
三一	“求异存同”	84
三二	科学决非万能	87
三三	“东风压倒西风”	89
三四	正——反——正	93
三五	雪莱预言工业发展的恶果	94
三六	药方	96
三七	西方向东方学习	98
三八	两种思维方式	99
三九	漫谈东西文化.....	102
四〇	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新阐释.....	104
四一	顺乎人心,应乎潮流	111

四二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	116
四三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122
四四	敦煌吐鲁番学·····	124
四五	史料空白的弥补·····	126
四六	变文的发现·····	128
四七	内容丰富、数量巨大的艺术品 ·····	129
四八	研究语言学和音韵学的价值·····	130
四九	宗教经典·····	131
五〇	研究古代科技的资料·····	132
五一	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者·····	132
五二	尊重,但不迷信 ·····	134
五三	阳关大道·····	136
五四	分析语言特点·····	138
五五	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	139
五六	混合梵文产生的原因·····	140
五七	佛教语言多样化问题·····	143
五八	关于原始佛典形成过程的设想·····	144
五九	佛典的写定和梵文化·····	149
六〇	研究吐火罗语的意义·····	151
六一	“佛”不是“佛陀”的省略·····	157
六二	“弥勒”是吐火罗语 <i>Metrak</i> 的音译名词 ·····	159
六三	利用音译梵字要特别小心·····	160
六四	确定研究要点的原则·····	162
六五	中印文化交流的意义、特点和规律 ·····	164
六六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167
六七	佛典中的“黑”与“白”·····	170

六八	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173
六九	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176
七〇	佛教的倒流及其原因·····	184
七一	“甘蔗”名号溯源·····	189
七二	甘蔗的种类·····	191
七三	“校”字考·····	194
七四	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	198
七五	老子在欧洲·····	203
七六	关于妓女祷雨问题·····	207
七七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215
七八	佛教兴起时的印度·····	220
七九	谈佛教的起源·····	227
八〇	释迦牟尼的名字·····	233
八一	释迦牟尼的家族·····	234
八二	释迦牟尼的年代·····	235
八三	释迦牟尼的生平·····	236
八四	原始佛教的教义·····	242
八五	释迦牟尼的说法方式·····	244
八六	释迦牟尼对社会改革的看法·····	245
八七	弥勒信仰·····	246
八八	我和外国文学·····	248
八九	一个故事的演变·····	255
九〇	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	261
九一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	263
九二	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	269
九三	“猫名”寓言的演变·····	276

九四	“鹦鹉救火”故事的来源·····	282
九五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285
九六	《西游记》与《罗摩衍那》·····	293
九七	我和比较文学·····	295
九八	说“嚏喷”·····	297
九九	比较文学之我见·····	301
一〇〇	对于X与Y比较文学模式的意见·····	304
一〇一	关于神韵·····	306
一〇二	神韵补遗·····	316
一〇三	再说“嚏喷”·····	318
一〇四	文学批评无用论·····	322
一〇五	论重译·····	323
一〇六	著者和译者·····	326
一〇七	谈梵文纯文学的翻译·····	329
一〇八	谈佛经翻译·····	333
一〇九	谈古代的“译场”·····	338
一一〇	翻译的危机·····	347
一一一	大学外语教学法刍议·····	353
一一二	我怎样写散文·····	357
一一三	谈写文章·····	364
一一四	《赋得永久的悔》自序·····	365
一一五	历史研究断想·····	368
	编后记 ·····	372

站在学术新潮流的前面

各国学术发展史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学术同宇宙间万事万物一样，都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变动的。变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不外两项，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一是新观点、新方法的萌生。梁启超论晚清时代中国学术发展时说：

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赡。（《清代学术概

这里讲了晚清时代一些新学问的开端,但是没有着重讲新材料的发见。王国维补充了梁启超的话。他说: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附录一:《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王国维讲,方壮猷记注)

静安先生对新材料之发见能推动新学问之诞生,从中国学术史上加以阐述,令人信服。他把“新发见”归纳为五类:一、殷墟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王静安先生的总结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非常正确的。

寅恪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

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页236）

他借用了佛教现成的术语，生动地、形象地提出了“预流”问题。我个人认为，不能再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方法了。根据这个标准，历代许多大学者都有一个预流的问题。不预流，就无法逃脱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窘境，学术就会陈陈相因，毫无生气，也决不可能进步。征之中外学术史，莫不皆然。王静安先生是得到了预流果的。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是得到了预流果的。中国近代学术之所以彪炳辉煌，远迈前古，其根源就在这里。

而在众多的获得预流果的学者中，寅恪先生毫无疑问是独领风骚的。他的成就之所以超绝人寰，关键就在这里。王静安先生列举的五类新发见，寅恪先生都有所涉猎。但是，人们都知道，他做学问最为慎重。他深知博与约的辩证关系。他决不炫学卖弄，哗众取宠。研究任何问题，都有竭泽而渔的气概，必须尽可能地掌握全部资料，才从中抽绎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他之所以自称为“不古不今之学”，正是他这种精神的表现。他自谦不通的学问，按之实际，也比一些夸夸其谈者高明不知多少倍。从他一生治学的道路来看，他是由博返约的。中晚年以后，治学比较集中。他非常尊重静安先生，“风义平生师友间”的诗句可以为证。但是他对王先生的经常改换题目，也还是有看法的。

他自己在静安先生列举的五类中，根据由博返约的精神，最后集中有敦煌写经和外族文字上；在历史研究方面，最后集中到隋唐史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史上。生平学术创获也多在这